动态 ·书评

拾遗补阙　　嘉惠学林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读后

黄爱平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一部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拾遗补阙的史志目录著作，由王绍曾先生主编，中华书局 2000 年出版，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清代史志目录。由于工作之便，得读该书，亦因研究需要，经常翻阅该书，故而颇有一些感触和想法，略述如下。

其一，拾遗补阙，网罗一代之典籍。众所周知，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其中，文献典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史稿艺文志》（简称《志稿》）“取则《明史》，断自清代”[①]，专载清人著述，计著录 9633 种，138078 卷。作为二十五史中的最后一部艺文志，《志稿》虽不无草创之功，但由于种种原因，漏略讹误所在多有，出版后即遭到范希曾等学者的批评，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脱漏。有“不应遗而竟遗者”，如“康有为、杨守敬书，一无所载，脱漏也”；有“一人所著，收其次要者，而最要者反遗去”，如“姚际恒收其《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目》，而未收其诸经通论，则尤属脱漏矣”[②]。他如“于八旗人著述，已未能详加著录，而于清文，亦仅于经部小学类略见十数最普通之字典、字汇，此吾人所引为绝大之遗憾者也”[③]。凡此种种，“若逐类尽举之，已可自为一书”，故范氏曾拟撰《清经籍志》十二卷附《存疑》二卷，以补《志稿》之阙，惜英年早逝而未成。其后武作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简称《补编》），计增补 10438 种，93772 卷，由中华书局于 1982 年与《志稿》合编出版。此外，台湾于六十年代重修《清史》时，彭国栋亦以一人之力纂成《重修清史艺文志》，在《志稿》原著录基础上，增补 8426 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 1967 年出版。二者对《志稿》均有补遗之力，但相对于有清一代学术文化繁荣、文献典籍浩瀚的实际情形，仍挂一漏万，阙略颇多。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简称《拾遗》）则真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是书依据 285 种国内外各种公私簿录及专科性书目，辅以实地查阅考证，凡确有刻本、稿本、抄本流传而为《志稿》及《补编》所遗漏未载者，悉予甄录，计收录清人著述 54880 种，375710 卷，数量远在《志稿》及《补编》之上。其拾遗补阙之功，足彰清人文献著述之盛，亦使一代学术文化之全貌，有案可稽，有迹可寻。堪称一代艺文，网罗大备，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其二，辨章学术，探索新旧交融之途径。清代既是传统社会的终结，又是近代社会的开端；其学术文化既集传统之大成，又深受西学之影响。这些特征，必然反映在一代学人著述之中。如何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是著录清代文献典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拾遗》对此作

[收稿日期] 2002 - 10 - 15
[作者简介] 黄爱平（1955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了可贵的探索。

在著录内容上，《拾遗》强调网罗放失，兼收并蓄，以窥全豹。诸如清代世俗文化空前繁荣，各种小说、戏剧、传奇、散曲、俗曲及弹词、鼓词、宝卷等作品繁多，数量惊人，但在传统目录著作特别是史志目录中，这类作品多遭摒弃。《志稿》编纂者囿于传统观念，仅收笔记小说；《补编》格于原作体例，亦只在子部小说类增收章回演义、附以弹词一类作品，不仅失载颇多，而且于鼓词、宝卷等付诸阙如。《拾遗》编纂者勇于打破陈规，视其为清代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这类通俗文艺作品悉数载入，从而大大拓宽了目录著作收录的范围，亦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分类体例上，《拾遗》则注重新旧并存，中西合璧。清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时期，前期有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学东渐，后期更有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而来的欧风美雨的浸润。各种新兴学科也因此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类新书以及译著数量繁多。而《志稿》泥于"艺文旧例，胥列古籍"[④]，对此几乎未予收录，《补编》亦多所忽略。《拾遗》则以超越前人的眼光，不仅广泛予以搜罗，而且在书籍归类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一方面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将凡可归入四部原有类目者，均各归原目。如在史部政书类、传记类下都分出域外之属，前者收录记载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外交等典章制度的著述以及译作，后者收录有关外国人的传记译作。子部医家类下另立生理病理之属，收录有关生理学、病理学方面的著述及译作。他如西方天文学、历学、数学方面的著述、译作，则直接归入天文算法类下天文、历法、算法各属。另一方面，对诸多出于四部原类目框架之外的有关西方声光化电和哲学社会科学一类著述，则增设新类目予以著录。如史部新立专史类，收录《中国文明小史》、《万国通史》、《西洋史要》等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国别史译著。又于子部特设新学类，专门著录西方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等各种新兴学科的译述、汇编之作。这些变通和创新，可以说为传统目录著作如何解决新兴学科的包容、归类问题走出了一条新路。

在尝试贯通、包容中西学术的同时，《拾遗》也在传统旧学的著录范围和部类设置上作了有益的探讨。清代学术文化繁荣，丛书的编纂和刊刻盛行一时，蔚为大观。《拾遗》借鉴前代目录著作的创例，特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增设丛书部，收录兼赅四部之丛书。有清一代方志大盛，数量繁多，《拾遗》也特将方志一类书籍从原置地理类中分出，另立方志类。在尽可能网罗著录清代小说、戏剧、传奇、散曲、俗曲及弹词、鼓词、宝卷等通俗文学作品之时，《拾遗》也参照有关目录著作的先例，将笔记小说一类作品仍归子部小说家类，而于集部另立小说类，专收话本及通俗小说；又将集部原词曲类分别分为词类、曲类，并于其后增设弹词鼓词类、宝卷类，以清眉目。凡此种种，皆体现了《拾遗》新旧并存，有容乃大的特点，也反映了编纂者的匠心和识力。

其三，标注版本出处，提供研究考索之方便。前代史志，或限于篇幅，或格于旧例，皆不注典籍版本，《志稿》、《补编》以及《重修清史艺文志》亦莫不如此。"然不有版本，其书之或存或亡，已刊未刊，稿本抄本，现存何许，均将无从稽考"[⑤]。古代学者对此已有明确认识，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首开目录著作专载图书版本的先例。沿及清代，版本目录学大盛，涌现出许多专门学者，而私家藏书簿录记注版本者，亦不在少数。并且，清代最大的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由于种种原因未注版本，亦遭学者訾议，后世乃有邵懿辰、邵章先后致力于《四库全书》著录各书版本之考索，撰成《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不仅提高了《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使用价值，而且大大方便了读者。《志稿》成书之后，针对其未注版本之弊，学者也曾明确指出："史志例不注版本，其著录之书，已刊未刊，及稿本、传钞本之存于何许，俱无从考见，徒存其目，为效有限。此实自来撰史志者之通病。"范希曾当时拟撰的《清经籍志》，就有"备列版本类叙，以供异日编撰定本清史者参证"的打算[⑥]。有鉴于此，《拾遗》大胆突破前代史志目录不注版本的通

例，为收录各书逐一标注版本，凡“一书有多种版本者，按刊刻时间先后排比，同一版本各书目著录题名不一者，均予合并。凡收入丛书者，均称‘某某丛书本’。民国期间版本，按习惯仍用‘民国’字样，一九四九年以后版本，统以公元纪年”[7]。这就为读者查找、利用图书，以及了解其传播和收藏情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标注版本而外，《拾遗》还于著录各书之下，兼载其出处，注明该书原见于何种书目，若同时见于数种书目者，亦一一注明。这一做法，不仅方便了读者，也反映了编纂者严谨的学风和负责的态度。

当然，作为迄今最大的一部史志目录，《拾遗》不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谨在此提出，供编纂者参考。

其一，书前目录未列三级类目。史志目录为一代学术文化所系，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图书分类体系反映出来。宋代学者郑樵就极为重视分类的作用，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8]，并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创立了三级类目分类体系。《拾遗》在分类体例上也下了相当的工夫，通过增设、合并、分置、改立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问题。特别是在三级类目的设置上，划分极为细致，归并也比较得当，颇具识见和功力。但书前目录仅列一级、二级部类，对其下包罗的三级类目，却阙而略之，不置一字，实为憾事。诸如史部将原职官类并入政书类，其下细分为类编、通制、仪制、职官、邦计、邦交、军政、法令、考工、掌故琐记、公牍、辑佚、域外各属，凡十三小目；又如子部医家类，前代目录著作大多不立小目，而《拾遗》根据清人有关著述的实际情形，于其下依次分为类编、医经、伤寒金匮、温病、总论、内科、外科、伤科、五官科、妇产科、儿科、痘疹、脏象骨度、生理病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按摩、外治法、养生、医案、医话医论、杂著、辑佚各属，共计二十五小目。凡此种种，相对于《志稿》和《补编》，以及传统目录著作的类目划分，不仅有分有合，而且还有许多变通和创新之处。特别是增设的新学类，其下细分为类编、总论、哲学、社会科学总论、政治、经济、教育、语文、地理学、自然科学总论、物理学、化学、地矿、生物学、工艺制造各属，计十五小目，其类目设置均为传统目录著作所无。然而，所有这些内容丰富、为数繁多的三级类目，在书前的目录上却未见标明，这不仅不利于反映一代学术文化的具体状况和发展脉络，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不便。

其二，仍有失收漏载之处。《拾遗》在为《志稿》和《补编》拾遗补阙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也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但由于清人著述数量繁多，收藏分散，爬梳搜集十分不易，故而难免有所遗漏。如《垤进斋诗集》，作者金文淳系乾隆四年（1739 年）进士，官知府，曾与裘曰修、袁枚等文人学者有过交往，后因罪谪戍以死，所著《经济斋诗集》十卷，又名《垤进斋诗集》，今存二卷，其钞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9]。但《拾遗》未见收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大规模传入，有关著述数量激增，如《西海纪游草》，作者林鍼原籍闽县（今福州），后移居厦门，曾因生计所迫，“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赴美国工作，二十九年（1849 年）回到福建。该书即为其域外纪游之作，也是近代中国人远赴海外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第一部作品[10]，虽然十分罕见，但仍有刻本传世。又如在鸦片战争时期较早来华的传教士中，英人合信是著名医生，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所著《全体新论》等五种医学著作[11]，是晚清第一批西医著作，而《天文略论》，则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著作。另一英人慕维廉精通地理学，所撰《地理全志》、《大英国志》二书，亦颇为著名[12]。但上述各书，《拾遗》仅著录合信医学著述中的三部书籍（《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其他均未见收录。

其三，尚有重复收录之处。由于《拾遗》系据数百种公私簿录及专科性书目编纂而成，各种书目记载著录的书籍，多有重见复出之处，必须反复比勘，细致核对，精加考校，方能准确著录。若稍有疏忽，便不免前后重出。如载振所撰《英轺日记》十二卷，既见于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又见于史部政书类邦交之

属；无名氏所撰《闽海纪略》，亦同时见于史部纪事本末类通纪之属和地理类杂志之属。

其四，个别地方不免讹误。如书前《目录》，于集部“戏曲类”误为“戏曲部”；又如《前言》中将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误为《四库未见书目提要》；《征引书目》所列杨殿昫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误为《中国历代人物年谱总录》。在书籍著录方面，也有一些疏失之处。如清初文人徐作肃《偶更堂集》，因其内容较有价值而传本稀见，曾列入《清人别集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2 年影印出版。《拾遗》著录此书时，将原传盛堂刻本误为傅盛社刻本，并失载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影印本。又如同一部书，著录为《历代舆地沿革图》，索引却为《历代地理沿革图》，不知何者为是。此外，亦有因校勘问题而出现的一些错字以及倒置之处，等等。

然而，瑕不掩瑜，尽管存在一些疏误和不足，《拾遗》仍不愧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收录最全、分类最细、使用最便的清代史志目录，其编纂者用力之勤，考核之精，识见之深，学殖之厚，乃至打磨之功，最终造就了这部传世之作。

不过，笔者在翻阅和利用《拾遗》之余，总有不尽惬意之感。由于工作和研究的关系，笔者既需要经常翻阅、利用《拾遗》，也不时要查检《志稿》和《补编》，深感清人著述分散收录在三处，查找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大胆提出一个建议，这就是将《志稿》、《补编》和《拾遗》三者合一，进一步加以纠谬补遗、排比编次，撰成一部完善全备的清代史志目录。为编好这部真正意义上的《清史艺文志》，笔者初步设想应做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志稿》和《补编》进行考订辨误，并补注版本。由于种种原因，《志稿》和《补编》讹误、重出之处所在多有，前贤时哲对此多所指摘，单篇考证订讹亦时有所见，但尚未有对其作全面考订纠谬者。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考订，纠正讹误，去除重复，同时仿《拾遗》之例，一一补注版本，以便查考。

第二，进一步扩大征引参考书目范围，以期搜罗全备。《拾遗》在为《志稿》和《补编》补苴脱漏时，曾广泛征引各种公私簿录及专科性书目，据统计，所参考利用的书目达 285 种之多。但国内外公私藏书机构以及各种簿录书目众多，虽编纂者勤加搜讨，多方罗致，仍有漏略。如国外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日本东洋文库汉籍书目，国内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文化机构藏书目录，以及香港、澳门图书馆藏书目录等，或限于当时条件，或由于其他原因，《拾遗》编纂者未能寓目，应尽可能予以补充。特别是近年来诸多目录著作的相继出版，更为清人著述的进一步拾遗补阙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文献资料。诸如其中专属清代的有：《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著，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版)，收录清代内务府、武英殿、国子监、钦天监，以及各部院衙门和各地官署刻印的由皇帝钦定、御纂、批准颁行之书；《清代目录提要》(来新夏主编，齐鲁书社 1997 年版)，收录清人编纂的有关经、史、子、集、佛、道、金石等各门类目录之书；《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郭霭春编著，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收录见于《清史稿》本纪、列传，并有传本存世之书；《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愈春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则均系汇录清人诗文集的集成之作。他如综合性目录有：《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王重民撰，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齐鲁书社 1996 年影印出版)、《中国丛书广录》(阳海清编撰、陈彰璜参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古书经眼录》(雷梦水编录，齐鲁书社 1984 年版)、《贩书经眼录》(严宝善编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专科性文献书目有：《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宁稼雨撰，齐鲁书社 1996 年版)、《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孙启治、陈建华编，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宝卷总目》(车锡伦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日］樽

本照雄编，齐鲁书社 2002 年版)；地方文献书目有：《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历代中州名人存书版本录》 (郎焕文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广东文献综录》(骆伟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等。这些专属清代的目录著作，以及诸多综合性、专科性，乃至地方性的书目文献，都收录有相当数量的清人著述。若要编纂完备的一代史志目录，对此皆应参考利用，并当进一步广泛征访，以免遗珠之憾。

第三，尽可能补充新近发现出版的清人著述。如《仪礼通论》，系清初著名学者姚际恒所著，为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九经通论》之一。但该书未有刻本，各家书目亦未见著录。直至 1932 年，顾颉刚先生始在杭州崔永安藏书中发现全本《仪礼通论》十二册，系姚氏海峰阁写定本，遂雇人钞出一部，存于北京。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崔氏藏书不幸遭日本人劫掠，《仪礼通论》原钞本不知去向，顾氏钞本亦因友人借出未及归还而下落不明。此后顾颉刚先生多方寻觅，前后历时数十年，始终未见踪迹。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该书已然佚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于 1994 年整理出版《姚际恒著作集》时，亦称该书“卷数不详，佚”⑬。但到 1996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先生在本所图书馆里竟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顾氏钞本，后经其整理校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1998 年出版。至此，“湮没三百年的古籍，终得公诸四海”⑭，实为学界幸事。类似这些新近发现出版的清人著述，亦有必要予以收录。又如北京图书馆整理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人的年谱，其作者亦多为清人，足资参考利用。此外，对现存的清人著述，尤其是近代以来西学大规模传入之后出现的各类著述、译作，也还大有进一步收集整理的余地。

第四，分类体例还可再加斟酌调整。在部类划分和类目名称上，《志稿》多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补编》亦无大的改变，仅在三级类目的设置上略有增益。而《拾遗》则在分类体例上做了新的探索，尝试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努力做到既囊括传统学术，又包容新兴学科。但任何新的尝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拾遗》也同样如此。诸如子部新学类之下所列地理学之属，如果归入史部地理类，似乎更为适宜。因此说，分类体例还当再加斟酌，以臻完善。

综而论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编纂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努力网罗一代著述，为《志稿》和《补编》拾遗补阙，若能进而将《志稿》、《补编》和《拾遗》三者合一，再加搜求征访、纠谬补遗、排比编次，撰成一部真正完善全备的清代史志目录，必将嘉惠学林，既为清史研究和大型《清史》的纂修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同时也促进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开展。

①④《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清史稿艺文志》卷前总序，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⑥朱师辙：《清史述闻》卷十七，《范希曾评清史稿艺文志》，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③朱师辙：《清史述闻》卷十七，《蠡舟评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

⑤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⑦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凡例》。

⑧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⑨参见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第 616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⑩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 - - 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 50 - 59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⑪⑫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印本，第 9、199、152 页；第 185、197 页。

⑬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序》，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古籍整理丛刊》，1994 年版。

⑭姚际恒著，陈祖武点校：《仪礼通论·点校说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